

重点 阅读

南丁精神的哗然释放

□杨晓敏

南丁先生八十有五,新出版了随笔集《半凋零》。我认为这是南丁精心描绘的一本由河南本土老中青三代作家、艺术家共同组成的群英谱,书中站立起来长长一串当代河南文学艺术界的优秀代表人物,可以看作是一本缩微版的“河南文学史记”。作者在一种大的历史背景下,在时代变迁过程中,对这些群星灿烂的文学艺术个体的梳理与解读,有很高的文学价值、文学史料价值和河南当代文学编年史研究的价值,对中原文化的延续、传承、发展注定会产生深远影响。

南丁人老文亦精,无论是叙事状物还是写人,笔力既酣畅淋漓、情感充沛,又从容淡定,收放自如。古人讲好文章的标准是“删繁就简三秋树”,南丁的文笔就是达到了这样一种火候吧。

《半凋零》写老一代作家艺术家这一部分,无论去世的还是健在的,我读出了一种文人相重的情怀。徐玉诺、苏金伞、常香玉、穆青、王大海、乔典运、庞嘉季等作家艺术

家,亦师亦友、疑义相析、奇文共赏,写那种从同一时代走来的淳朴友谊、共同理想,即使写那些坎坷困顿、顽强生存、缺憾惆怅,都显得雅致达观,生动鲜活,字里行间浸透的绵长记忆、美好情缘乃至某种惺惺相惜之情也会扑面而来,令人无限感喟。写中青年这一部分,我读出了一种深深地嘉许、由衷赞叹与博大宽容。比如写到中原文坛的文学艺术中坚力量如张一弓、田中禾、李佩甫、张宇、杨东明、何向阳、王剑冰、王澄、曹新林、赵富海以及去世的乙丙、孙方友等等,娓娓道来,如朋友交心,折射出来的是一位慈祥长者对松青竹翠的欣慰目光,令人怦然心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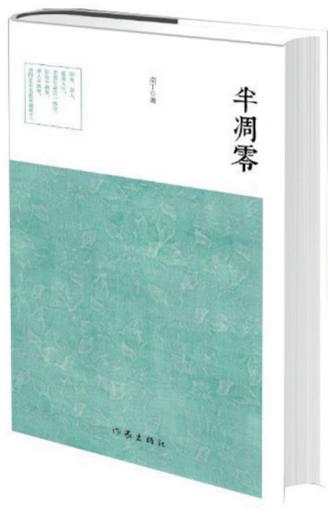
传统文化里讲士大夫应“立功、立言、立德”,现代人叫“办事与传道”。假如这话不仅仅局限于“治国平天下”,而是也可以置放在每一个不同的职业里,那我们是否可以更加立体地来认识这本书的作者南丁。

多年来,南丁作为一名文学界老领导,曾指导、协调和服务于一个庞杂的文化团队,尤其在发现、培养、扶持、组织和造就河

南文学创作队伍方面,不遗余力,慧眼识才,褒扬后学,令人高山仰止,肃然起敬,至今仍被共识为新时期文学豫军的旗帜和掌门人,可谓立功办事;身为一代知名作家,六十余年坚持笔耕不辍,著述甚丰,奉献出皇皇五卷巨制,成为传世的精神食粮,影响了社会各界一代代众多的读者,可谓立言布道;以一介书生,而能在立言、立德上坚持身体力行,终生不渝,其一生修为体现了有责任感有担当的“士大夫”襟怀,不仅在当代文坛,即使放在源远流长的中原文化的历史长河中,也是屈指可数的文贤之一。

古人云:“荐贤举于贤。”这是一种比“见贤思齐”还要高的境界。《半凋零》的出版,可以看作南丁精神的再一次哗然释放。衡量社会文明的高度、厚度与丰富性,不可或缺的是它的文化传承及代言人,在此意义上讲,有南丁先生这样一个典型的文化符号存在,河南文学幸甚,中原文化幸甚。

(《半凋零》,南丁著,作家出版社2015年11月出版)



书香茶座

玉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它发源于新石器时代早期而绵延至今不衰,悠久的历史证实了这一文化的生命力及其价值。在古代中国,玉不仅是一种物质存在,同时具有鲜明东方色彩的文化象征意义。在历史传统中,玉与国家政治、与身份等级也从来没有脱离过关系。即便在中国文学最具经典地位的《红楼梦》中,也是从一块出土的“通灵宝玉”写起,更无须说汗牛充栋的“以玉入诗”的名篇佳作了。但是,世风代变。进入市场经济之后,一切都可以纳入以货币为价值尺度的范畴之内来衡量或交易。“交易”是最后的价值表达形式,而幕后的各种令人震惊的“怪现状”我们几乎一无所知。

报告文学作家白描的《秘境——中国当代玉市考录》在呈现玉文化历史的同时,也为我们讲述了这一文化在当下市场经济环境下的曲折发展和惊人畸变:《秘境》让我们看到了玉文化另外一个隐秘的世界。这是我们不熟悉的一个世界:一方面,玉器与玉文化维持着它强大的生命力,迎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发展高峰;另一方面,玉文化褪去了它的高贵、雅致以及蕴含的原有的文化和象征意义。在很多情况下,它的全部价值被明目张胆地改写、颠覆甚至本末倒置。在这部书中,作者在表达他的价值立场的同时,也以诸多笔法,熔文学性、知识性、学术性、可读性为一炉,在场景、人物、事件等的生动描述中给读者以艺术的享受和知识的启迪。

作品的开篇《20颗籽玉》,写一对新疆和田玉夫妇的狡诈和高超的骗术:他们携带20颗籽玉报价60000元,最终以24000元成交。其中有三颗带皮的籽料,经几位“眼睛”也未能识破。但天外有天,玉雕厂的兄弟两人慧眼识玉,断定这是假的,“是用山料锉出来的,滚籽,新疆人叫磨光籽”。而这买料人不是别人,就是作者本人。后来这对夫妇的儿子得了急性阑尾炎,就医无门。作者得知后联系医院,使孩子得到了救治,这对夫妇要报答作者,前嫌尽弃成为朋友,也就应了“化为玉帛”的一段佳话。这样的故事让人喜忧参半,莫衷一是。如果没有后面的故事,作为买玉人的作者如何释然可真就难以想象了。

白描的这个开篇,很容易将读者引到另一条阅读想象中:这仅仅是一部披露中国玉器市场“秘闻”故事的作品,就像清末民初的“黑幕小说”或“谴责小说”那样,将另一个领域的秘密揭示出来,以满足“窥视者”的“快意恩仇”,但事情远不是这样。《8000年长河》是一篇足以显示白描对玉文化历史研究功力和报告文学作家文学功力的作品。他从8000年前的一个剥野猪皮的场景进入叙事,这是一个男人和一个女儿般的女孩如诗亲情的故事,那个得到了美丽项链的女孩该是多么幸福,但这个故事却并非闲笔。8000年后,还是在那个男人把项链挂在小女孩脖颈的台地上,一场规模巨大的发掘正在进行。这里就是“兴隆洼文化”遗址所在。作者通过这一切入方式,讲述了玉文化的历史及其与帝王将相平民百姓日常生活的关系,着重介绍了孔子和秦昭王如何在不同玉文化领域开了先河。孔子的贡献在于赋予了玉以新文化属性,即赋予了玉的人格化、道德化的含义;而秦昭王则开创了玉的交易史和诈骗史。孔子将玉赋予人格化和道德化的含义,并不难理解,玉的11种德,只要读诗书便可了解。但通过“完璧归赵”的故事,白描解读出其中的交易和诈骗,确实别有新意。如此说来,当下玉器市场的诸多不轨行为,也是冤有头债有主了。

“收藏热”从一个侧面折射出改革开放后人民的殷实生活,以及收藏市场对民间各种趣味和爱好满足的可能。玉是收藏热的重头戏之一。在《收藏热》中,作家说:“藏玉佩玉,历来被视为具有德行操守的表现,而不是身份地位以及财富的象征。另一方面,一件玉器,往往集中体现了某段特定历史时期丰富蕴含和一个民族的智慧才华,小小物件,有着探究不尽、回味无穷的文化意蕴,使人真切感受到中华历史文化的悠久、博大和深邃,激励人们倍加呵护与珍惜。”这是从正面理解当下的收藏热。另一方面,“收藏一旦走向纯功利目的,驱动力仅仅是价值的提升和利润的谋取,它的人文精神内涵势必遭到贬损,导致收藏市场浑浊不清甚至是畸形发展,甚至导致玉器知识的普及和玉文化的传导扭曲变形。”对后一方面的警觉、抵制和批判,应该是《秘境》的基本主旨。在这个领域,白描可以说是见多识广。他不仅是玉文化的普及者传播者、黑幕市场的揭露者和见证人,也是一位深具功力的玉石玉器鉴定专家。随意一例,就足见他玉器鉴定的功力及玉器行当之深。

因此,对中国当下玉器市场的“秘境、谜境”的忧虑,就是白描挥之难去的在喉之鲠。他认为玉材质的国家检测标准,“已很难适应发展变化了的现实”,销售者为了产品销路要求质检单位出具“羊脂玉”证书,质检单位为为了利益对这种要求也给予满足,但“羊脂玉”连标准都没有,这种检测不啻为瞒天过海。而翡翠检测的情况也大体如出一辙。于是,混乱的玉器市场与没有权威的检测标准就构成了未做宣告的“合谋”关系。《秘境》在披露玉器市场失序的同时,有更深刻的思考和洞见。这更表现在作者对当下中国社会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传统价值理念日渐沦丧所表达的深深忧虑,对重建社会价值支撑和道德秩序的一种深切呼唤。

如果是这样的话,《秘境》就不能简单地看做仅仅是一部“暴露”玉器市场黑幕、“谴责”不良商人道德的作品。它更是一部在忧患中有批判,在无序中发现本质的作品。这也正是一个有良知、有责任感的作家与业内专家著述不同的地方。因此,读《秘境》不仅让我们有机会看到了一个表面光鲜无比、内里鱼龙混杂的玉器交易世界,更重要的是,也让我们看到了它背后的全部复杂性以及一个报告文学作家的胸怀和远见卓识。

(《秘境——中国玉器市场见闻录》,白描著,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6年1月出版)

隐秘玉世界 细观玉轩吟

□孟繁华



■新知新思

戏剧符号学与本土戏剧实践的有机融合

□张健

中国当代戏剧研究在编剧、导演、表演、剧目等领域成果颇多,但对剧院,尤其是系统性的剧院演剧艺术研究,仍然较为单薄。北京人艺是中国当代舞台艺术最高成就的杰出代表,也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对象。日前出版的《困守与新生——1978—2012的北京人艺演剧艺术》,将新时期以来的北京人艺作为研究对象,一定程度上具有填补空白的意义,也为北京人艺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新的方法。

首先,该书可谓剧院研究的一次新的尝试。全书从时间(剧本)、空间(导演)、身体(表演)角度切入北京人艺的演剧创造,阐释了北京人艺30多年发展变化的内在基因,在历史与现实的相互对照中,揭示北京人艺研究的特殊性所在,为读者较为清晰地展示了后焦菊隐时代北京人艺“困守”的艰难与“新生”的愿景。同时,在写作方式上,该书把研究对象放在一个大的文化格局之下进行审视,将其作为“百年中国话剧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戏剧人探索话剧民族化道路不可或缺的重要阶段”,“它遇到的诸如如何认识斯坦尼体系,如何看待话剧民族化与现代性的关系,如何形成话剧的中国学派、民族风格等理论与现实课题,都是中国话剧发展过程中必须面对、必须破解的难题”。这就使全书的立论、分析站在了一定的学术高度,抓住了问题的关键所在。可以说,作者在书中提出的难题不仅是中国话剧赋予北京人艺的历史使命,也是其在写作中努力去思考和探讨的。

阅读该书,不难发现,作者的北京人艺研究具有强烈的当下性,他时刻注重理论研究与当下美学实践的“对话”,用戏剧符号学的研究方法去观照现实问题。观众的审美期待和文化需求随时代而变,剧院的



演出不能轻视或落后于观众对舞台的判断。北京人艺的艺术创造要变化,但不管怎样,如何“表现”人、“表演”人,是剧院发展中始终需要回答和探索的课题,也是作者对北京人艺研究的现实关怀所在。这一问题解决的是否得当,不仅关乎着中国话剧的未来,也考验着渴求“新生”的北京人艺。

其次,该书是戏剧符号学理论与本土戏剧实践的一次有机融合。中国当代戏剧研究,离不开理论的支撑和总结。西方戏剧理论的产生,大都依托特定的戏剧实践和文化土壤,与20世纪西方戏剧舞台变迁和实验思潮紧密相连,并非都可以照搬到中国话剧的舞台实践和研究中。但如今,很多戏剧研究者以西方的戏剧理论为高,喜欢套用、挪用时髦的西方戏剧理论经典著作;在分析中国话剧的美学问题时,言必引某某国外戏剧理论大师、导演的话,使得国内话剧研究缺少本土的针对性、有效性。

该书的理论、方法基础是戏剧符号学。这一理论方法发端于20世纪初,上世纪80年代曾被译介到中国,但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都显得较为沉寂。作者分析了戏剧符号学在中国水土不服的原因,指出了这种研究理论的核心在于“实践性”,即如何利用这种原理和方法,在借助多学科理论工具的基础上,研究具体的文本意义。他尝试把这种方法运用到对北京人艺的研究中,实际上是借助这种方法提醒我们,研究还是要回归戏剧本身,关注文本内部的隐秘构成,促使我们重新回到剧场。该书的创新之处在于,不是从抽象、僵化的理论出发,而是在现实问题的判断分析中,发现这种研究方法的有效性和实践价值,将戏剧符号学最新的研究成果与中国话剧实践及民族戏剧审美原则相结合,探索总结结合本土戏剧创作和演出的戏剧符号学研究方法和框架。这种研究思路,不仅拓展了当下戏剧研究的方法、路径,而且有助于读者从时代、文化乃至世界戏剧发展的视角,观察中国话剧遭遇的问题,进而找到可能的解决途径。

再次,该书体现了作者强烈的问题意识和严谨的治学态度。由于无法亲历现场观看或者缺少相应的影像资料,话剧舞台创造中导演、表演美学的研究很多时候是滞后于剧本的。作者主张带着问题回到“现场”,从影像“文献”中寻找论据。为此,他利用在北京人艺挂职的时间,翻阅了大量的历史文献资料,观摩了可以搜集到的所有剧目,使该书的写作建立在了大量一手资料的基础上。书中,我们能够读出作者对新时期以来北京人艺演剧艺术发展的宏观审视,也能够看到作者敏锐捕捉到的微观视角和独特发现,而这些“发现”往往是过去研究中所忽略的。比如,作者从戏剧符号学

中受到启发,强调了身体符号在观演交流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一个细节的动作、姿势往往最能体现出观演双方之间的默契程度以及由此形成的演剧风格”。他通过身体符号产生的意义,发现了这些意义与北京人艺观演交流模式之间的内在关联,为我们思考北京人艺演剧学派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一个新的切入点。

该书叙事严谨,结构清晰,论证详实,语言如同作者的为人,朴实、真诚,不花哨、不艰涩、不浮躁,但正是在这些质朴的文字背后,可以看到其清晰的审美判断和价值立场。他将自己对话剧的热爱投入到写作中,也把自己的焦虑和期盼呈现在了读者面前。“如何让传统的‘光晕’不再仅仅作为历史辉煌的象征,而是体现着当下的活力、当代的审美趋向;如何让创新不再变成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的任性为之,而是真正成为遵循舞台艺术规律,具有现代性、开放性、前瞻性的美学实践。”作者的这些困惑与思考,体现了可贵的反思意识和治学态度,对于今天重新思考北京人艺演剧艺术的发展不无裨益。

作为第一部运用戏剧符号学对北京人艺进行整体研究的专著,该书不免存在一些弱点。作者对戏剧符号学的分类标准、理论探讨还需更加清晰、深入;对舞台演员身体符号系统中“表情”、“姿势”、“语言”的分析有所欠缺,这方面尚有进一步挖掘的空间;新时期以来北京人艺上演的国外剧目众多,但书中能够进入阐释对象的却很少,对这些剧目演出特色的总结、评价,应该在研究中所反映。

(《困守与新生——1978—2012的北京人艺演剧艺术》,徐健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10月出版)

■开卷絮语

心灵里流露出的世界

□韩嘉川

斯里兰卡是戴升尧的又一个精神领地,这是读完了他的新书《斯里兰卡的心灵之旅》之后的感受。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他这些年不断行走于若干佛教圣地,且写下了大量的文章,其中有些文章达到了相当的文学高度。在那些圣地,他可以看到别人看不到的事物,听到别人听不到的声音。在这部新书中,作者又有一些什么独特的发现呢?

《斯里兰卡的心灵之旅》先叙述了斯里兰卡的历史,特别讲述了宗教史,以及这个狮子国历史的传说。而作家自己的感受是那里浓浓的湿气使人在窗外看一会儿,眼睛就会蒙上一层雾……在参拜伊苏鲁姆尼亚寺的时候,作家看到“或白或紫或红的睡莲闪着阳光的亮色立在绿叶之上”,参拜的时候,外面突然下起了雨,而天空依然是湛蓝的,几片云棉絮一样飘着,阳光闪闪地摆在空中。“光灿灿的阳光穿透雨滴,形成一条条银灿灿的雨线,密密地从天上到地上……”作家为这五分钟的大雨而惊喜,以至于对那个供奉佛像的圣地恋恋不舍。在作家游历斯里兰卡期间,尽管是雨季,却一直没有雨,而他在参拜圣地时感受到了仿如甘露的大雨,作者的感受自然是与此处的虔诚心境有关,也是在叙述宗教法力的博大魅力。

菩提树,由于释迦牟尼在其树下彻悟,所以被称为佛教智慧的象征。这种智慧让信徒得到生命的解脱,找到了一种从容、宽容、平等、超脱的观察世界、对待世界的方法,给这个世界带来了更多的和平、安宁、和谐、幸福和慈爱。无论它的内涵与外延所具有的意义有多大,作家在那棵神圣的菩提树下看到的是这样一番景象:“菩提树的树荫下,人们或

坐或立,还有的跪在沙地上祈祷着。成千上万的人,竟没有一个在看手机。他们神情从容、淡定……好多人双手合十,或在诵经,或在祈祷,那种虔诚和自然给人一种静态的美感……诵经的声音抑扬顿挫,低柔轻缓。”祈福,是每个信徒的心愿,然而祈祷“和平、安宁、和谐、幸福和慈爱”却是一种境界。大自我的心,是难以进入另一种境界的。

其实,在参拜“三味佛像”时,作者做了很好的解答。“三味佛像”建于比萨帕利玛舍利塔晚些时候的公元4世纪,是遗迹中惟一保存完好的。两米左右高的“三味佛像”端坐在方石之上,双目微合,从正面看呈一种冥想的神情,平静、安宁;从左侧面看,却似在忧伤,在为天下众生的苦难和愚昧忧伤;而从右侧面看,他的神情又换成了欢喜,他在欢喜什么呢?作者的感悟是:“佛的境界已经是无悲无喜无忧无愁,这尊佛像以三昧的神情显现给世人,无非是给世人以思考和启示而已。他究竟让我们思考什么?又究竟会给我们什么启示呢?相信每个有思想的人,心里都会有自己的答案。”

波隆纳鲁瓦是斯里兰卡的第二大古城。这里曾是南印度人、僧伽罗人几代王朝的都城,其古迹遗址的丰富可想而知。作者在叙述了他所看到的一处古迹以及皇宫之后,他感慨于:“博物馆里陈列的佛像和石像几乎难以找到一尊完整的,缺胳膊少腿没有头是常见的,这让人联想到战争的残酷性,连这样坚硬的石头都毁坏了这样,那些血肉之躯又会成什么样子呢?”

战争与动乱,即便是在有信仰的国度也难以幸免。位于

山城康提的佛牙寺便于1998年的佛牙节那天,被猛虎组织在寺院大门安放了一枚炸弹,造成了一桩惨案。因而,祈祷和平与安宁,在斯里兰卡是宗教信仰的一大主题。

和平如蓝天与空气一样,既是人们身边不可或缺的东西,又是弥足珍贵的。甚至与宗教信仰一样,令人用一种虔诚的姿态孜孜以求。在作者写下的这部既是游记题材的书稿,又是心灵旅程的记录中,它占有相当的篇幅。当然也是作者在游历斯里兰卡中的切身体会。

在贾夫纳这座城市,作者便是在阅读这块土地上的战争史。作者感慨道:贾夫纳是一个极具个性的城市。“贾夫纳是斯里兰卡最大的少数民族泰米尔人的聚集地,也是泰米尔印度教文化和宗教中心。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和特殊的历史,贾夫纳一直是一个战争的火药桶……连年的战争,破坏了泰米尔这座古城的艺术、文化、经济和谐。”不仅仅在上个世纪经历了近26年的战争,历史上从公元前5世纪开始,战争的阴霾便不断笼罩在这块土地的上空。

然而,“贾夫纳的历史决定了它的城市文化、建筑的与众不同,这个城市的经典建筑大部分是印度寺庙,还有不少基督教堂和天主教堂”。即使战争摧毁了建筑,摧毁了环境,甚至摧毁了人性,但是信仰却依然存在,特别是基督教与天主教,更是广泛的存在。

任何人,任何事,只要用心去做去写,终究是有人之处的。这本书对戴升尧来说,是一种心灵的展露。也许作者在写作过程中没有意识到其中的文化含量与文学意义,但是他所展示给大家的却是人们在惯常情况下,或者用俗世的眼光去看待所看不到的东西,这便是这本书的可贵之处。

我们看不到、听不到、感悟不到的东西由作者的心灵流露于笔端,这就是这本书的意义所在。

(《斯里兰卡的心灵之旅》,戴升尧著,江西高校出版社2016年1月出版)